

# 中原时评

个论

##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理当担责

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对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修正案草案进行二审。根据草案规定,“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、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,造成消费者损害的,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”。全国人大法律委有关负责人解释,这意味着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应承担民事责任。

消法修正案草案中的这一规定,与今年5月最高法、最高检出台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负责人的表态相吻合——明星代言虚假广告,虽难以被追究刑事责任,但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受到行政处罚。确实,明星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影响力,所以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危害性。眼下明星代言问题多多,亟须规范,规范手段之一便是让代言虚假广告的明星承担责任。只有这样,才能“倒逼”明星大腕们爱惜自己的“羽毛”,不拿自身信誉为题产品背书。

但是,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担责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,这不仅因为什么是“虚假广告”缺乏严格界定标准,更重要的是,代言虚假广告有时并不是明星的错。

虚假广告不同于违法广告,作为明星大腕,恐怕极少有人利令智昏为违法广告代言,也很少有人明知是虚假广告而代言之。实际上,明星代言最常见的问题是:这款产品本是正规的合法产品,这个广告本是正规的合法广告,只不过,后来该产品爆出质量问题,甚至被有关部门查处,于是此前为其代言的明星备受舆论指责。那么,这样的广告算不算虚假广告?代言明星该不该承

担责任?

且举例说明。去年,毒胶囊事件曝光,号称做“良心药”的修正药业陷入“良心”的拷问,而此前为修正药业代言的明星们也遭到网友“炮轰”,认为他们应为自己的不当代言承担责任。这些明星包括孙红雷、张丰毅、陈建斌、林妙可、林永健、陈小艺等,其中林永健的经纪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林永健选择代言时一直很慎重,要求企业所有证件都齐全,现在修正药业出事了,林永健其实“很无辜”。

平心而论,林永健们确实有些无辜,因为在毒胶囊事件曝光之前,他们不可能知道修正药业的产品有问题,事实上全国人民都不知道,连监管部门都不知道。修正药业“所有证件都齐全”,意味着所有监管部门都认为修正药业的产品质量可靠,在此情况下,明星们为其产品代言,有什么错呢?

类似情况并非个案,而是一种普遍现象。大多数明星是爱惜自己声誉的,代言广告是谨慎小心的,并非有意忽悠消费者,但怎奈他们防不胜防,经常被蒙蔽。问题企业“所有证件都齐全”,这不是代言明星的错,而是监督部门的错,如果要明星为此承担责任,就相当于要明星为监督部门的失职承担责任,这无疑是不合理、不公平的。

因此,对于明星的不当代言,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该担责的担责,不该担责的也不要冤枉他们,相关法律条款需要进一步细化,以防误伤无辜,而不应粗线条、简单化、一刀切。与此同时,监管者失职、渎职的责任,更值得认真、严肃地予以追究。 □浦江潮

街谈

## 京城一过节为何就那么拥堵

据《新京报》报道,首都最堵月即将到来,北京《2013年9月缓解交通拥堵专项行动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正式实施。《方案》提出,9月有9个重点拥堵日,这几天各企事业单位可实施弹性工作时间。报道还说,学校新学年开学、中秋节和国庆节紧邻、商业打折促销活动频繁、探亲访友聚会旅游出行增加、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,各种因素叠加对北京交通运行造成巨大压力。2010年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拥堵指数就达9.0,全市交通几乎瘫痪。

细看报道,9个重点拥堵日,除新学年开学、教师节和一个不限行工作日外,另6个拥堵日分别为中秋节前3日(拥堵指数预计8.2),国庆节前3日(拥堵指数预计一天8.5,另两天7.5左右)。

国庆节全国放长假,很多游客涌进北京,造成拥堵可以理解。因为拥堵的根本原因是人多路少,大家集中出行,集中使用交通工具,甚至同一时间使用道路交通,以至交通不堪重负,拥堵在所难免。

可是中秋节为什么会让北京交通几乎瘫痪?答案很简单,一是因为2011年中秋节是9月12日,往前三四天正好是北京高校开学的时间段内;二是,全国各地晋京送礼送月饼。第二个原因貌似牵强,还真是个事实,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讲过那么一句话:“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,都是送月饼的。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,我们的政府可能就好了。”可见,北京中秋节因送礼造成拥堵由来已久。

“中秋之堵”,表面上看,这是一座城市之堵,实际上是权力之堵,即,通往权力之路太拥挤,太多的人在这条路上扎堆前进。看看年年创新高的“国考”报名人数,多么拥挤的景象;通过“国考”上了车,要想有个好座位,还得用尽办法挤;各地要项目要规划要政策,拼命往京城挤,有关部门或门庭的门槛都被踩平……在这一路上,仿佛就没有不拥堵的。

送礼送出长龙阵,送礼送得一个偌大的城市发生交通拥堵(估计还能送出交通事故来),这真是一个世界奇观!城市的拥堵是权力拥堵的结果,也是权力拥堵的真实写照。这蕴含着两层意思,一方面,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口依附于权力,让“权力城市”无节制地摊大饼,形成长期拥堵;另一方面,特定时期的权力回馈行为,造成超负荷的拥堵,成为难解之疾。

从这个角度看,治堵某种意义上先治权。倘若权力并非至上,“当官”不是一种“上选”,别的途径出路多且比当官“吃香”,权力这趟车就不会这么拥挤。倘若不“跑部”也能“钱进”,不“跑官”也能“升官”,不“跑项目”也能得“项目”等,“权力城市”至少不会因为送礼送出大拥堵。

说实话,并非大家都喜欢拼了老命去拥挤,拥挤于身于心于财于产都是一种负累。多数时候是制度让人累,为了减少这些拥挤之累,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游戏规则,资源分配均衡一点、公平一点,让人变得轻松一点? □廖保平

街谈

## 德总统涉700欧元受贿案受审的启示

德国下萨克森州法院27日作出决定,前总统武尔夫涉嫌收受好处及向朋友提供好处将接受庭审。武尔夫涉嫌受贿的金额为700多欧元(约合5600多元人民币)。

看到这样的报道,我们可能会觉得好笑。2011年12月,媒体揭发武尔夫在任下萨克森州长一职时,曾接受朋友低息贷款购房,从而牵连出其一系列收受好处及利用职权“帮朋友”的事件,导致武尔夫在2012年2月辞去总统职位。可是,后经过调查,能够算得上受贿的仅有700欧元。这在咱们看来,武尔夫似乎有些“冤”。

能够认定武尔夫受贿的金额不仅小,而且那还是2008年,武尔夫和家人在参加慕尼黑啤酒节时,由一位担任电影制片人的朋友代付的住宿费。指控认为之后,武尔夫曾在不同场合向人推荐过这位朋友制作的影片。这更加有些不可思议。

不说受贿5600元人民币,就是50000元人民币的受贿案,近年来在中国就很少听说过。给人的印象是,这些年,不仅贪官的胃口越来越大,受贿的数额越来越高,而且纪检法律部门,所认定的贪污受贿起点也越来越高,区区5600元人民币,是不会被认定犯罪的。中国的贪官前赴后继,一方面说明他们都“不好好学习、改造”;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,我们的贪污受贿认定标准有些失之于宽呢?

还有,武尔夫不过接受了朋友代付的700欧元住宿费,并不是接受现金和实物,却被认定受贿,对于我们反腐败也是很好启示。按照5600元人民币就被追责标准,我们每天不知有多少官员搞公款吃喝开支要远高于这个数,甚至一桌几万元、十几万元的请吃和吃请,官员们都敢吃。官员吃喝一般最多仅认为是搞不正之风,极少被有罪追究。官员个人和家庭接受旅游等公私招待的也很普遍,都没有被列入贪污受贿追究。德国人的收入是我们好几倍,我们的贪污受贿数额认定标准是不是应该更低一些呢?

因为涉案金额不大,有人建议武尔夫接受庭外调解,劝他交一定罚款算了。但武尔夫不干,坚持要在法院接受审判,因为他自认为没有犯罪。武尔夫的态度我们姑且议,但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细节,那就是当媒体报道武尔夫有受贿行为后,武尔夫就被迫下台,接受司法单位调查。反观我们一些案例,被举报者官位不仅稳如泰山,而且还有组织出面为其辟谣,跨省抓捕举报者等。官员遭举报后,首先应该先查一查官员有没有问题,而不是先认定举报不实。你查都没有查,怎么能够认定人家举报有问题呢?

武尔夫涉嫌受贿的例子告诉我们,反腐败从小抓起,比抓大放小好。否则“小”的放任自流,“大”的也会越来越多。道高一尺魔高一寸显然不行,必须魔高一丈。香港公职人员花几百元港币请客都要被追责,是香港官员清廉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□陈豫川

个论

## 城市化岂是城市包围农村

最近,国家发改委的一个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,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约1.5个新城新区,144个地级城市竟然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。

不用借鉴数字支撑,如今任何一个人只要走出门看看,最能够听到的已不是植物生长的声音,而是脚手架边城市拔节而起的声;最能够感受到的不是原野的宁静,而是城市摊大饼的排山倒海之势。

这是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时代。城市在扩张、乡镇在长大,似乎只是在转眼之间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新区、宜居新城、开发园区之类又从农村和原野古老的沧海桑田中探出头来,而人类铺设的道路、管道、轨道像一条条坚固的锁链,日复一日地重复缠绕,深深地勒进了地球母亲的肩膀。

诚然,我们已经走上了不可逆的城市化道路。但是城市化绝不等同于城市毫无顾忌地包围农村。

城市化,至少包含两层意思。一是要“化”起来。所谓“化”起来的反面正是城市沦为空城、鬼城。城市化要有产业载体,要实现工业化、信息化、知识化、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同步协调推进。城市要有欣欣向荣的产业支撑,城市化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、产业成长战略、就业增长战略、环境生态战略、农村现代化战略等的总称。只有建房修路绝不是城市化,城市化甚至于还包围周边农村的现代化。圈地建城的衔枚疾进,很难不滑入建空城、鬼城的渊藪。

城市发展战略绝不是写在应景规

划文本中的空洞猜想。那些急于建新城甚至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、国家一流城市的主政者们,不妨认真查一查你所在的城市有多少空置房。有多少商品房没有出售,有多少商品房已售出,但是晚上一片漆黑。在扩建开发区时也考虑一下有多少写字楼基本人去楼空,有多少工业园在晒太阳甚至于像荒漠一样存在。如果一边是老城新城日渐空心化,一边又大举包围过来,硬逼着农民拆迁退地,逼着农耕圈无限制地后撤,这笔账认真算起来,很难说不是是一种双输的尴尬选择。

二是城市化要有节制。城市不能无止境地消灭农村,城市化的过程也应是农村脱胎换骨且跃入现代化的过程。有专家指出,过快的城市化不仅不能实现城乡同步的现代化,反过来会导致城市的农村化畸形发展局面。我们知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,总会有一些城市群会脱颖而出,但地不分南北、城不分大小,所有的城市都急于扩张,稍有点基础的城市就嚷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,就连小乡镇也开口闭口建设中等城市,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144个地级城市竟然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,已难说不是毫无节制的城市建设竞赛。

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农村包围城市,如今,在急切的城市化步履中,我们看到,权力和资本所率领的建设大军正布下一个又一个的大包围圈,正在把各自近处远处的农村领地稳稳地收入囊中,已经很难看到圈占农村包围农村时必要的审慎和节制。 □严辉文